

中外关系史

ZHONGWAI GUANXI SHI
ZHONGGUO WAIJIAO SHI

研究

卢苇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王叔凯
文实

中外关系史
ZHONGWAI GUANXI SHI
研究

封面设计：陈革

ZHONGWAI GUJIAN XISHIJI ANJIAN

中外关系史

卢苇 著

研究

兰州大学出版社

中外关系史研究

卢苇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中外关系史研究

卢 苇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市天水路 308 号 电话:8617156 邮编:730000

E-mail:press@lzu.edu.cn

<http://www.lzu.edu.cn/press/index.htm>

兰州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排版

甘肃新视野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

2000 年 2 月第 1 版

200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00 千字

印数:1~1500 册

ISBN7-311-01627-4/K·212 定价:23.50 元

前 言

我和中外关系史似乎有缘,年轻时教书是从亚洲史课开始,以后又搞过中国西部地区史、中亚史、中俄关系史和丝绸之路研究等等,直接为研究生开设中外关系史课程迄今已20年。之所以和它结下了不解之缘,也许和长期的工作地点有关系。我在高校历史系工作近50年,先是在祖国大西北的兰州地区度过,以后又调入南方沿海的广州地区,上述两地恰是中外关系史上陆海交通的重要据点,因而长期以来的科研教学都和中外关系史有密切联系。

虽然近20年来中外关系史已越来越为国内学术界所重视,但比起其它历史学科来仍然显得冷清。最近又在一些朋友的鼓励和劝告下,特别选择了一批文章编成这本集子,但愿能活跃一下冷清的气氛,并引出更多的佳作名篇。书中所选文章,绝大部分是属于80~90年代我在杂志上公开发表过的作品,只有极少数是新作,其中又有两篇是属于早期(60年代初)发表过的作品:《印度莫卧儿王朝的阿克巴改革》和《华侨旅居印尼和印尼的契约华工》,前者由于国内很少有人研究过,后者因为印尼排华活动长期猖獗,甚至不久前还发生过,虽属早期著作,但仍然具有一定意义。全书共29篇文章,除了4篇为一般性外,其余都可归类,组成五个部分,分作五大篇章:(一)“丝路篇”,共由六篇文章构成,其中关于陆海丝路的出现

和形成以及两者在唐代时期的变化和更替,应该说是具有一定新意;(二)“西域篇”,一共选了9篇文章,实际是对陆上丝绸之路一些问题的探讨,尤其是侧重于对唐代陆上丝绸之路极盛时期的研究,其中特别是利用唐诗以补文献资料的不足,想来可以起到一点启示作用;(三)“南海篇”,一共选了4篇文章,主要是阐述古代中国和东南亚关系,如果和以下第(四)“郑和篇”的3篇文章联系起来看,直接反映了宋明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从而使中国和东南亚关系出现了新的友好高潮;(五)“海南篇”,虽然海南属中国本土,但不可忽视的是它又是祖国南方门户,曾一直是中西海上交通的重要据点,并在沟通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因此选择了已经发表过的3篇文章载于此,以供参见。

岁月匆匆,倏忽年近七旬,虽说是搞了大半辈子的中外关系史,所出成果不多,亦乏得意之作,但它毕竟属于历史产物,至少是一段时期水平的反映。故趁此新世纪即将到来之际,编成了这本集子以献大家,仅供回顾和指正。作为一本纯属学术性的书籍,由于无利可图,肯定是吊不起一些出版商的胃口。因此,首先要感谢兰州大学出版社的同志,只有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下才能使这类纯学术性书籍得以问世。此外,需要特别感谢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外关系史博士生导师纪宗安,在本书的编选和修改中采纳了她的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最后,本书之得以出版,还有赖于我爱人潘淑钰副研究员的鼓励和帮助,如果没有她全力支持,我是很难在此较短时间内完成任务的。

卢苇

1999年夏于广州暨大羊城苑

目 录

前言	(1)
我国中外关系史研究的拓荒者——陈垣	(1)
朱杰勤教授对中外关系史研究的贡献	(9)
中国历史上的闭关政策和封建社会的没落	(17)
中国儒学在远东的传播	(27)

丝路篇

丝绸之路的出现和开通	(31)
海上丝绸之路的出现和形成	(45)
论唐代丝绸之路的发展变化	(56)
唐代丝路的变化和海上丝路的兴起	(73)
岑参的“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章”诗与丝绸之路南道	(93)
宋代以前长江中下游经济发展和海上丝路的繁荣	(104)

西域篇

论两汉西域都护府	(118)
唐代的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	(133)
从唐诗中看唐代西北边疆	(151)
岑参西域之行及其边塞诗中对唐代西域情况的反映	(176)
论岑参的《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诗	(190)

唐代安西四镇之一的碎叶

——兼论王方翼筑碎叶城在中亚不在焉耆…………… (202)

古代中亚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218)

唐代中国和大食在中亚地区斗争的发展和变化…………… (221)

帕米尔的历史争端…………… (241)

南海篇

宋代海外贸易和东南亚各国关系…………… (248)

古代越南吞并占婆

——印支半岛上一个文明古国的消失…………… (264)

华侨的旅居印度尼西亚与印度尼西亚的契约华工…………… (275)

印度莫卧儿王朝的阿克巴改革…………… (288)

郑和篇

论郑和下西洋与东西方交往及东南亚地区的繁荣稳定…………… (305)

郑和下西洋与东南亚贸易圈…………… (313)

郑和下西洋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 (325)

海南篇

历史上的海南在国内外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 (335)

明代海南的“海盗”、兵备和海防…………… (351)

清代海南的“黎乱”和清朝政府的“治黎”政策…………… (369)

我国中外关系史研究的拓荒者

——陈垣

我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长期处于世界历史发展的前列，直到16世纪前，中国的文化曾在世界历史上占有极为崇高的地位，并对世界文明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与此同时，中国为了自身的发展，也不断吸取外来文化的精华。从遥远的古代起，中国就和世界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并展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历史发展本身表明，中外关系史是一门重要学科，如果要深入了解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都脱离不了对中外关系史的研究。目前，中外关系史已成为世界显学，受到了中外史学家的高度重视，并做出丰硕的研究成果。

我国自古就重视对外关系现状和历史研究，从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开始，此后历朝正史中都有“西域”、“南海”和“东夷”等传记，其中就包含了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成果。但自近代以降，随着国式衰微，我国中外关系史研究也日益衰落。尤其到了20世纪初，中外关系史研究已在西方掀起热潮，并成了当时外国汉学家们的热门课题，而中国在这方面仍处于十分落后的地位。难能可贵的是，当时在我国史学前辈中不乏其有为之士（其中就包括了年青的陈垣），并不甘心于这种落后，而是奋起直追，曾为改变其落后状态付出了巨大努力并取得很大成就。对于这些先辈们的奋进精神，我国前中外关系史学会理事长、已故的孙毓棠教授说得十分明确：“我国中外关系史研究，目前仍处于落后的状态。

过去一些著名学者如张星烺、冯承钧、陈垣、向达诸先生曾为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做了不少拓荒的工作。如资料的整理、文献的翻译和一些专题研究，都作出了卓越的成绩”。^① 陈垣教授正是如此，不愧为我国中外关系史研究的拓荒者。

年青时的陈垣，满怀爱国激情，为了弘扬中华文化，振兴民族精神，曾于1921年在北京大学一次集会上，针对当时中外关系史的落后和汉学研究中心不在中国而痛心指出：“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东京如何，没有提到中国的，我们应该把汉学中心，夺到中国，夺回北京。”^② 陈垣号召学术同人，加强团结，努力奋斗，一定会使我国的中外关系史研究“超过别人，超过外国”。他本人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上所做贡献是巨大的，以下仅就几个主要方面谈谈：

一 对外来宗教史做出了开创性研究

在中外关系史上，思想文化交流据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古代思想文化交流，首先有赖于宗教传播。通过宗教传播和传播宗教的僧侣作媒介，同时也展开了包括宗教以外的各种思想文化的交流。例如以佛教为媒介，古代印度哲学、天文、历法、医药、音乐、雕刻、绘画乃至建筑等随之传入中国，并对古代中国思想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作用。陈垣十分重视对外来宗教的研究，他在这方面的著作不少，其中的代表作有：《元也里可温教考》（1917年）、《开封一赐乐业教考》（1919年）、《火袄教入中国考》（1922年）、《摩尼教入中国考》（1923年）、《明季滇黔佛教考》（1940年）、《清初僧净记》（1941年）以及《基督教入华史略》（1924

① 《中外关系史论丛》第一册之前言，1985年世界知识出版社。

② 刘乃和：《书屋而今号励耘》，见《励耘书屋问学记》。

年)、《回回教入中国史略》(1927年)、《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1932年)、《从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说到石老娘胡同当街庙》(1933年)、《关于四十二经考》(1933年)等。值得注意的是,几乎古代传入中国的主要宗教陈垣都进行过研究,并留下了珍贵著作,这在当时中外史学家中实属少见,充分表明了他的功底深厚,学识渊博。

重要的不仅是他著作宏富,还在其论作的资料翔实,立论稳固和见解新颖。以摩尼教考为例,其时对此宗教来华考证辨析,探其源流者大有人在,甚至以《摩尼教入中国考》为题者,除陈垣外尚有王国维与伯希和、沙畹两本同名论著。但前者比后者,不仅毫不逊色并具有新的特色。陈垣的《摩尼教入中国考》,共分十六章,从摩尼教的起源论起,依次讨论其传入中国的时间及媒介,其与回纥之关系,在唐代传播的范围,以及在宋、元、明各朝的流布与遭遇,末述其与中国秘密教派之间的联系等。该文论述完整,考辨明晰,正本清源,体大思精。无论在材料选择上,或立论的推敲上,都具有独到之处。此文一经刊出,立即获得中外学者的称许和好评。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曾指出:“新会陈援庵先生垣,往岁尝取敦煌所出摩尼教经,以考证宗教史,其书精博,世皆读而知之矣”。^①在另一文中,陈寅恪又谈到:《摩尼教入中国考》“其书精博”,“海内外学者咸已诵读而仰慕之矣”。^②

《火祆教入中国考》,是陈垣教授对我国外来宗教研究的又一杰作。它和《摩尼教入中国考》一样,全文以十二章铺开,对火祆教源起,始通中国,唐时流布,宋之残存等,一一指正、考核,详加论述。尤其辟有唐宋人对火祆、大秦、摩尼之混同专章,从而找出了包括“前清学者,如钱大昕、杭世骏、徐继畲、朱一新

① 《陈垣敦煌劫余录序》

② 《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

等之考大秦景教，均不免此弊”^①的错误根源。这无疑是对火祆教史研究的一大贡献，如此全面系统，根据确凿地探讨火祆教在中国之传布，不仅当时所未见，即使今日也难以超过。

此外，陈垣教授对于基督教来华历史和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等，都进行过深入研究，并取得了重大成绩。前者著名论作有《基督教入华史略》和《元也里可温教考》，特别是《元也里可温教考》受到中外学者的格外推崇。后者代表作是《回回教入中国史略》和《中西回史日历》编纂，尤其是《中西回史日历》的出版，直接为中国和阿拉伯各国关系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陈垣的《回回教入中国史略》中，就有根据中回历法的正确换算，纠正了中国历史文献和碑刻中的许多谬误，从而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建立了新的起点。

总之，陈垣教授十分重视外来宗教史的研究，写出了不少高质量、高水平的论著，广泛探讨了各种宗教在华的流布，曾为我国外来宗教史研究做出了开创性成就。他的这些宏篇巨著，至今还闪烁着光辉，充分显示出我国史学前辈的功力雄厚，学识渊博。

二 为西域华化问题研究作了奠基工作

关于西域人华化，无疑是中外关系史中又一重大研究课题。古代的西域，从广义上讲包括了中亚、南亚、西亚，以及东北非各地。历史上广大西域地区的许多国家人民，或因战争，或因贸易等各种原因，曾不断地大批地移居到中国。这些移居者及其后裔们，由于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而不断华化，正是这些华化了的西域人，直接反映出古代中华文明在广大西域地区的影响作用。陈

^① 陈垣：《火祆教入中国考》，见《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垣十分注意这一问题的研究，由于他特别精于《元史》，因而从1923年至1927年，先后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和《燕京学报》上全文刊载出了他的《元西域人华化考》重要论著，该书获得多次再版，并在国内外久享盛誉。

《元西域人华化考》，全书共分八卷，卷首为绪论，除了对西域范围和文化状况有所交待外，并对华化意义加以阐述。余下各卷，主要是考证出了葱岭东西168位西域华化者，并分别归类于儒学、佛老、文学、美术、礼俗、女学等各篇。卷末并附元西域人华文著述表和徵引书目。自从该书出版后，立即引起了中外学者的重视，我国国学大师陈寅恪不仅指出：“是书之材料丰实，条理明辨，分析与综合二者俱极具工力”，并高度赞扬它，“精思博识，吾国学者自钱晓徵以来未之有也”。^①

值得注意的是，陈垣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反映了我国近代史学研究一个新的变革开端，它标志了我国史学研究正摆脱清代以来的经学束缚而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关于这点，陈寅恪在为是书作序中说得十分明确：“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缔。而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外学人所推服。”^② 同样，随着陈垣这一杰作问世，也标志着我国中外关系史研究开始了新的转变，从而开辟了华化西域研究的新领域。此后，从二三十年代起研究历史上西域人华化问题的新作不断涌现，其中不乏其佳作，如冯承钧的《唐代华化蕃胡考》，不敢说是受到陈垣的影响，至少也是属于同一转变时期中的产物。其时，在全面研究西域华化问题，不仅研究西域人的华化，并进而研究华化了的西域人。如果说前者着重于探讨古代中国文明在西

① 《重刻元西域人华化考序》，见《励耘书屋丛刻》版。

② 《重刻元西域人华化考序》，见《励耘书屋丛刻》版。

域的传播，则后者主要是研究西域文明之传入中国。古代中国历史上有不少华化西域人，充当了西域文化传入中国的媒介，在古代中外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古代乐舞为例，中国乐舞传统中的外来西域成分，主要是有赖于华化西域人的传播。据中国史籍所载，我国历史上的著名乐人、舞工中，有不少是属于华化了的西域人。如北齐时，源出于中亚安国（今布哈拉）的安未弱、安马驹和源出于中亚曹国（其行政中心在今泽拉夫善河南）的曹妙达等，他们都是当时著名的华化乐工，受到北齐后主高伟的垂青，并获得了“开府封王”的赏赐^①。唐初，因华化的安叱奴善舞，而被高祖封为散骑常侍。此外，唐代著名的华化琵琶演奏家还有曹保、曹善才、曹纲等，尤其是“琵琶号第一手”的康昆仑^②，更引起了长安城的轰动。此康昆仑，显然是源出于中亚康国（今撒马尔罕）的华化西域人。

以上，仅仅是以乐舞为例，如进一步探讨中国文化艺术中其它领域，如绘画、雕塑、建筑等，几乎无一不是通过华化西域人而传入了西域成分。总而言之，对于华化西域人和西域华化研究不可忽视，它直接关系到中国文化交流问题。陈垣教授的著作，正是在这方面起了开创和奠基作用，其筚路蓝缕，功不可没，值得后世中外关系史研究者永远珍视。

三 在敦煌学中的重要贡献

敦煌学虽然是一门独立学科，同时又和中外关系史有着密切联系，甚至可说是中外关系史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陈垣教授，

① 《通典》卷一百四十二“乐二”：“后主唯赏胡戎乐，耽爱无已，于是繁习淫声，争新哀怨，故曹妙达、安未弱、安马驹之徒，至有封王开府者，遂服簪纓而为伶人之事”。

② 段安节：《乐府杂录》。

学识渊博，著述宏富，他不仅注意对敦煌资料的运用，而且十分重视对敦煌文献的整理、编辑和研究，从而为我国敦煌学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陈垣教授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有：《敦煌劫余录》是他经过多年辛劳、呕心沥血，发奋之作。他在早年十分痛心于世界宝藏敦煌文献遭受到帝国主义文化贩子的窃取和满清官吏的巧夺。1922年，当他出任京师图书馆馆长时，馆内只剩下8600卷劫余之物，为了挽救这些珍贵遗产，陈垣在俞泽蓀协助下对其遗书进行整理。他们紧张工作，“日以百轴为度，凡三阅月，而八千轴毕”^①。到1924年，以陈垣为首于北京发起成立了“敦煌经籍辑存会”，并推举他为采访部长，通过各种渠道调查征集流散各地的敦煌遗书，汇集公私所藏，并经系统整理，最后编出全部遗书的总目录。后又经过努力，终于在此基础上完成了《敦煌劫余录》初稿，但却“未及刊行，会又停顿”^②。直到1929年，再经过“删其复出，补其漏载，正其误考”^③，到了1930年，才由历史语言研究所印行。全书凡十四帙，前三帙著录了佛经、律、论、杂文396种，道经9种，摩尼教经1种，第十四帙著录了周叔伽的《续考诸经》86种、《俟考诸经》66种。这是一部博大精深的巨著，不仅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编成的中国馆藏敦煌文献的目录书。陈垣的这一巨著出版，无疑为我国敦煌学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深受国内外学者赞扬。陈寅恪称此书为“治敦煌学者不可缺之工具”^④。

《跋西凉户籍残卷》，是陈垣敦煌学研究中的又一杰作。此文完成于1963年，其时他已83岁高龄，可见其功夫之深厚，质量之高深。该文不仅对残卷年代作出了精确的考定，并对残卷中的

① 《敦煌劫余录》序。

② 《敦煌劫余录》序。

③ 《敦煌劫余录》序。

④ 《敦煌劫余录》序。

姓氏人名、成丁年龄，乃至逐字逐句反复地推敲，通过他的广泛联系，深入探讨，一片不满九户的户籍残纸，终于被他不断推出新意，考证出了许多重要问题。如他通过残卷中的“命名为道、德、仙、宫，实受道教之影响”，以及各户中命名“如魄、如金、如嵩、如寿等，亦辄有修炼长生之意”。仅仅从这里，就足以使人信服陈垣教授学识之渊博和宗教史修养之高深。

虽然陈垣在敦煌学研究方面，其著作数量并不多，但质量之高却是一般人难以企及。即使像我国著名目录学家王重民，也不得不叹服，说陈垣的《敦煌劫余录》：“这样细致、渊博而又正确的目录，不是任何人所能作的。”^① 尽管在今天，我国敦煌学研究已有了新的发展，谁也不能忽视陈垣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以上从外来宗教史研究、西域华化问题以及敦煌学三个方面，充分表明了陈垣教授不愧是我国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伟大拓荒者。最后需要提到的是，陈垣之所以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上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受到了海内外学者的高度赞扬，并非偶然，除了他所具有渊博的学识和深厚功底外，并和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分不开。正是在爱国主义精神激发下，才使他能孜孜不倦的在当时这片荒芜的中外关系史土地上努力耕耘，硕果累累。适值陈垣教授诞生 110 周年之际，谨奉献上这篇短文，藉以表示对他的敬意和纪念。

①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后记》，见《敦煌遗书论文集》，中华书局版。